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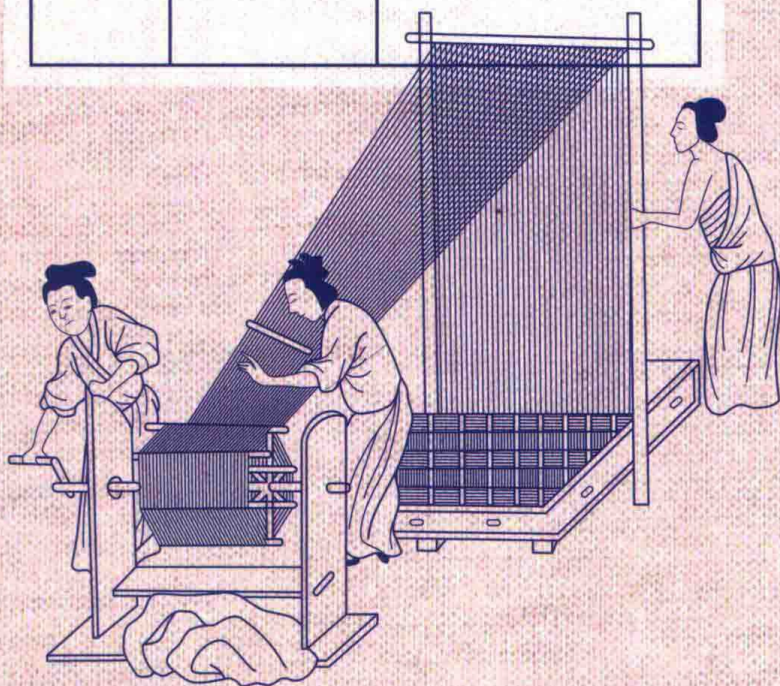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JCZH079）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 地域文化的形成

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
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

李斌◎著

梁文倩◎绘图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ZH079）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 地域文化的形成

——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

李 斌 著

梁文倩 绘图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 容 提 要

本书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对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探究该地区染织技术到染织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嬗变过程。首先,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深入到知识生产者之中”的方法,以知识生产者群体内部视域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研究;其次,运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任何一种知识产生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则,对长三角地区各项传统染织技术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合理的研究,找出染织技艺、神话传说、礼仪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地方性的知识能形成与当地相适宜的文化”的观点,从正反两个方向分析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与染织文化、区域文化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运行机制相互促进。

本书史料翔实,图片丰富,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染织技术与文化的专业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李斌著.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6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系列丛书)

ISBN 978-7-5180-7309-2

I. ①从… II. ①李… III. ①长江三角洲—染织—文化研究 IV. ①J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1486号

策划编辑:宗静 责任编辑:胡蓉 宗静
责任校对:江思飞 责任印制:何建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A407号楼 邮政编码:100124
销售电话:010—67004422 传真: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218千字 定价:9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

项目（17YJCZH079）资助

同时感谢下列基金和组织的大力资助：

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服饰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

江西服装学院

湖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

前言



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呼应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阐释人类学研究方法，它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反对知识的“全球化逻辑”，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各国对于自身的文化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某项传统工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长三角地区蕴含大量的传统染织技艺，中国纺织史学界和民间工艺界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越来越多。然而，他们多是从长三角地区某项染织技艺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从染织技术的内核角度（内核主要是指纺织技术，包括技术起源、纺织器具、工序和工艺、产品纹样等方面内容）展开；二是从染织技术的外延角度（外延主要是指神话、传说、祭祀、礼仪等方面内容）展开。这两种研究趋势有着明显的缺憾：一方面，缺乏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视角和模式的单一性，即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标准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进行评价，辉格史观明显。

笔者认为，在地方性知识的视域下，尊重染织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与相对独立性，还原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生成的具体情境，挖掘其背后深厚的区域文化。从而，公正地看待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在辉格史观和反辉格史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试图摆脱旧有的研究模式，引入多学科（如文献学、科学史、经济学、人类学等）进行论证，找到比较合理展现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理论方法。该研究，一方面，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保护、借鉴作用，有可能形成全新的传统染织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通过中西方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比较，强调中西方传统染织科学的对话，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1.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国外研究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文本并不多见，只有德国学者库恩于1992年在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黄道婆（13世纪）的传说——从纺织专家到种艺英雄》一文是对长三角地区古代棉纺织技术的直接研究。但我们可以从国外有关中国或世界染织史的著作中找到该地区染织技术研究的相关内容。如库恩主编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纱卷》（英文版）最具有代表性，其中关于长三角地区纺纱技术方面的介绍较为细致。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对保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中国古代染织物进行过具体的研究，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属于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所为。然而，从整体上看，国外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这些研究要么从全中国的宏观角度，要么从某一件染织文物的微观角度进行探讨，缺乏中观角度（区域染织技术、区域文化）的研究环节。其次，国外学者的研究注重染织文化的内核的研究。最后，国外学者一般是在西方文明中心的理论上研究非西方的染织文化，缺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嫌疑。

国内研究的特点有以下三点。一是国内研究多以长三角地区某项传统染织技术为对象，对其工艺流程、染织技术以及织物纹样特点等有详细的介绍，但对深层次的问题，如工艺思想史、工艺变迁、工艺传播的论述较少。二是针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传统染织文化缺乏系统的研究，虽然有陈维稷、朱新予、黄能馥、周启澄、赵承泽、赵丰、钱小萍等学者编撰过中国古代染织技术史等相关的专著文本，其专著有大量关于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术的内容，但大多是从宏观上解读中国染织史，重视中国染织科学技术的内史研究。三是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内容涉及内核和外延两方面，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必然与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国内学者似乎并未将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术和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形成联系起来，未曾讨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还原长三角地区区域文化的本原还需进一步研究。

2. 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国内外以西方科技文明为标准的文化研究路径已经被证明越来越没有活力，很多都被学界所抛弃，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知识体系，它们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西方文化也不例外。如果将西方科学法则作为神圣的信条，人类无疑会失去精神家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因此，非西方国

家传统染织文化的研究必须在地方性知识的视域下，以传统染织文化的内核和外延为基础，与人类学、科学史、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采用多维度的方式来表征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同时，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研究目前差不多已经完成各项传统染织技术的研究，需要在区域文化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研究内容

笔者认为，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深入到知识生产者之中”的方法，以知识生产者群体内部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研究。即深入到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传承人的群体中去，以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各项染织技艺，避免“旁观者清”——带有“西方科技中心论”倾向性的研究。首先，将该地区的传统染织技术按棉、丝两大类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然后，记录各项技艺传承人的口述内容，并结合染织器具作为考察尺度，分类理清其起源发展的脉络。

笔者认为，深入到长三角地区各项染织技艺传承人之中，考察各项染织技艺所使用的织造工具，倾听他们对各自技艺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并结合染织工具与历史文献的分析，才能合理地解读各项织染技艺的本原。如考察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起源与发展的的问题，首先，要考察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与海南黎锦织造技艺所用的织造工具，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渊源。同时，还要倾听这两项技艺传承人对黄道婆其人其事的描述，结合黄道婆的史籍记载，追寻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真正本原。又如，苏州宋锦、南京云锦与四川蜀锦某些织物品种均采用小花楼织机织造，如果不深入到传承人中去倾听他们对织造工具和技艺起源、发展的口述史，仅凭史籍记载和纺织品文物的分析，是无法公平、公正地对待这些织造技艺。

(2) 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任何一种知识产生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则，对长三角地区各项传统染织技术的传说、神话和相关礼仪进行深入合理的研究，即抛弃神话、传说以及相关礼仪中所体现的迷信和专制方面的内容，找到它们背后所要表达的技术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找出技艺—神话传说—礼仪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神话传说、礼仪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该地区的传统染织技术产生后，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一些反映染织工匠的技术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神话传说，进而促进相关礼仪的产生和发展。与之相对应，神话传说、礼仪对技术又可能反向产生促进的作用。如在织造宋锦、云锦、缂丝等高级织物前，纺织工匠要净手以敬神是织造这些高级织物前所需要的技术要求。而在织造过程中则在敬神的借口下，禁止喧哗，则是织造过程相当复杂、需要保持心思缜密状态的要求。由此可知，技术规范可能是借助于神话传说、礼仪得以加强。因此，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文化正是在染织技术这一内核的基础上派生出神话传说、礼仪，并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具有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染织文化。

(3) 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地方性的知识能形成与当地相适宜的文化”的观点进行分析。一方面，对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地域文化”的发展、形成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染织文化→染织技术”的影响、促进作用进行反向分析。从正反两个方向分析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与染织文化、区域文化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运行机制相互促进。当然，地方性知识理论主要是运用在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在人类考古学上看，这些原始部落属于较低等级的文化阶段，远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因此，在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对于长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还需要从古代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方面介入。

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各地域由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环境的不同，造成各地域所能承载染织技术的种类有所不同，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染织技艺。各种染织技艺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将其染织文化深深地烙印在区域文化中。区域文化又通过反作用促进染织技术的发展。如上海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主要是由于乌泥泾地区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不适合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但非常适宜棉花这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当黄道婆将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传播至此，迅速推动当地的“棉花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产生崇拜黄道婆的区域文化。黄道婆崇拜的文化又导致当地对棉纺织技术的崇拜，人们在祭祀黄道婆的同时举行“赛神”——纺织技术的比赛，反向极大促进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提高。当然，长三角地区各项染织技术均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在地方性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区域文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式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重点是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史进行梳理，难点是如何对各项染织技艺传承人的口述技术史进行甄别。对地方性知识这种新视域下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采用口述科技史与历史文献、语言、法律、禁忌等文本来相互印证的方式甄别各项技艺传承人的口述史。拟在长三角地区传统纺织技艺中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染织技艺（乌泥泾棉纺织、蓝印花布、苏州缂丝、宋锦、南京云锦、杭州杭罗六项传统染织技艺）进行实地调研，每项染织技艺选取两名以上的传承人进行访谈，抓住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史发展的重点。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之二：重点是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文化的合理性进行解读，难点是长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传统染织技术为何没有触发“中国式的工业革命”的思考。拟在地方性知识理论指导下，系统地对中西方传统染织技术、染织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强调中西方染织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站在地方性知识角度和反辉格史观的高度来看待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地方性染织技术与文化。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之三：重点是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地区从“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地域文化”形成过程的考察，难点是在从地方性染织技术促进地域文化形成，以及地域文化反向促进地方性染织技术的提高和发展过程中，“技术”“技术文化”“地域文化”三者之间的机制是什么。拟从地方性的“染织行会”“祭祀礼仪”的运行机制来解读在“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和“地域文化”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机制。

四、研究思路

笔者认为，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思路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资料搜集阶段。一方面，围绕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以及该地区地域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搜集文本信息；另一方面，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深入到知识生产者中”的方法搜集长三角地区口述染织技术和口述染织文化方面的资料。

第二阶段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地域文化的分析表征阶



段。在染织技术和文化方面采用文本信息与口述信息互证的方式，抛弃伪信息，从而系统、科学地表征染织技术和文化。当然，在表征染织文化时，运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任何一种知识产生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则，抛弃西方科技文化的评判标准。

第三阶段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文化以及地域文化三者关系的综合分析阶段。运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地方性的知识能形成与当地相适宜的文化”的观点，对该地区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判断是否有新发现，进而形成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新见解，如果未有新发现，则提出该课题某方面的假设，重新回到资料收集阶段，进行新一轮的论证。正是在这种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论证—判断—假设的循环论证中完成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全新解读，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本书是笔者对近六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有些观点和材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李斌

2019年3月



起源篇

第一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棉织染类地方性知识溯源寻根

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南路棉花传播 / 004

第二节 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起源 / 012

第三节 南通蓝印花布的起源 / 019

参考文献 / 028

003

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纺织类地方性知识本原分析

第一节 南京云锦地方性知识的产生 / 032

第二节 苏州宋锦地方性知识的产生 / 041

第三节 苏州缂丝地方性知识的产生 / 049

第四节 杭州杭罗地方性知识的产生 / 058

参考文献 / 067

起源篇小结 / 071

031

技术篇

第三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纱线类地方性知识架构

第一节 上海乌泥泾传统棉纺技术 / 078

第二节 中国长三角地区的传统丝纺技术 / 086

参考文献 / 094

077



097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类地方性知识解构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的传统织机的形制分析 / 098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的传统织机的织造技法 / 111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的传统印染技术 / 122

参考文献 / 127

技术篇小结 / 128

文化篇

第五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类地方性知识与地域文化的嬗变

第一节 黄道婆文化奠定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基石 / 134

第二节 宋代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与朱克柔缂丝艺术风格的形成 / 139

第三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丝织业行会与地域文化的构建 / 145

第四节 纺织神话传说与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完善 / 152

参考文献 / 162

文化篇小结 / 166



133

传承篇

第六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知识的重构

第一节 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体验式保护传承模式 / 172

第二节 蓝印花布元素在女装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 181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发展困境分析 / 191

第四节 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机制和模式 /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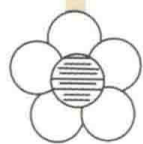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205

传承篇小结 /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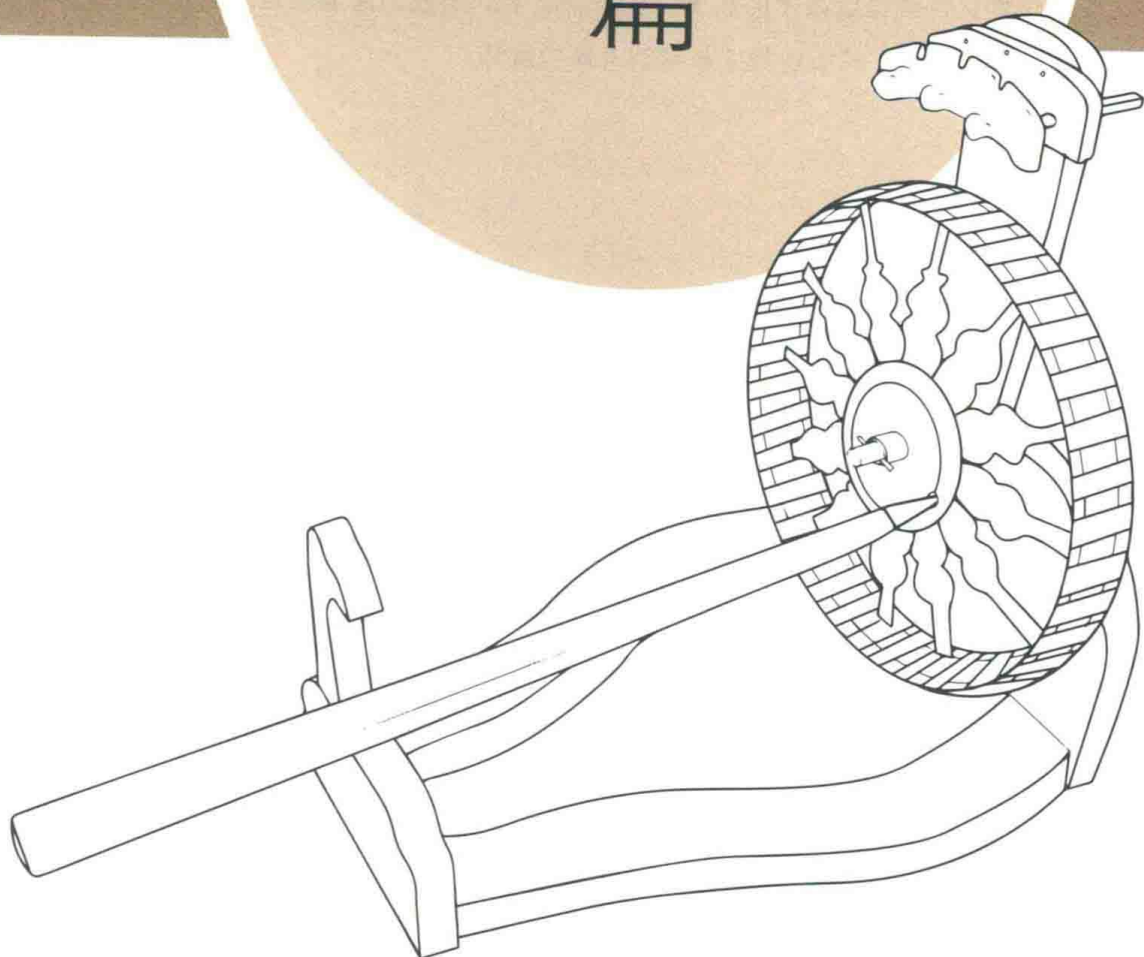


171

后记 / 211



起源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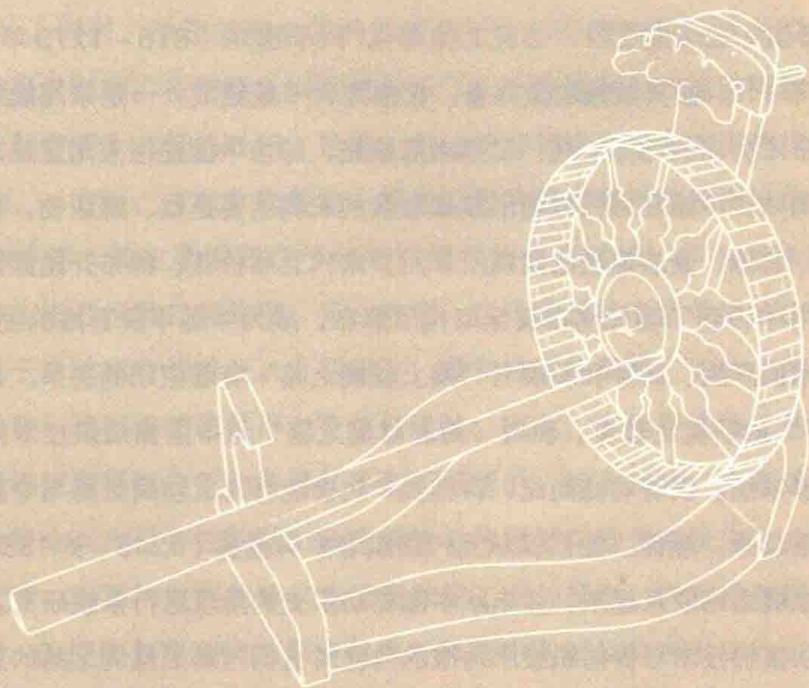


中国长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染织技艺包括上海乌泥泾棉纺织、南通蓝印花布、南京云锦、苏州宋锦与缂丝、杭州杭罗等技艺。由于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的产生时间距今过于久远，不论是本土还是西方学者们研究这些染织技艺的起源问题，都必须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处于“他者”角度，毕竟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产生的时代、语境与当代差异很大，研究者们都会受当下所处时代语境的影响。因此，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的起源研究，就必须认同它们起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一章

长三角地区传统棉织染类地方性 知识溯源寻根





中国长三角地区棉织染技术的代表是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和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它们在工序之间存在着的承接关系，正是在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产品的基础上，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才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棉织物的历史信息虽然自汉代（公元前202～公元前8年，23～220年）就已经大量见之于中国史料，然而，汉族平民采用棉织物作为衣料的时间并不长。正是在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和南通蓝印花布技艺的推动及影响下，自宋（960～1279年）末元（1271～1368年）初至明代（1368～1644年）这一时期，中国汉族平民才逐渐完成主要衣料由麻织物到棉织物的转型。毫无疑问，长三角地区传统棉织染类地方性知识中的棉纺织知识是在海南岛以及广闽地区棉纺织技术的基础上，成功完成棉纺织知识当地化，形成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相反，长三角地区的蓝印花布印染知识则是在当地产生、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性知识，随着棉布的普及，逐渐被应用到棉织物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南路棉花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海上航线，它与“陆上丝绸之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又具有规模庞大、航线易变的特点。它萌芽于商周（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256年），发展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形成于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兴于唐宋（618～1279年），转变于明清（1368～1911年）^[1]。按其航线的走向看，它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东海航线，即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二是南海航线，即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线。众所周知，中国在宋代以前汉族聚居区的衣料主要是丝、麻织物，棉织物只能作为稀罕物为皇室、官僚、豪族等统治阶级所享用。宋代之后棉花、棉布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史料和官府的文书中，到了明代棉布甚至取代了麻布，成为中国平民百姓的主要衣料。然而，中国棉纺织技术的产生、萌芽和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比较多，但对“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棉纺织技术传播的探究却比较少见，且不够系统。仅有司徒尚纪、许桂灵^[2]明确地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棉纺织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联系起来。然而，他们仅从元代纺织专家黄道婆（1245～约1330年）技术人生的角度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并未从中国棉纺织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植棉技术与棉纺织技术两维的角度对它们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棉种传入中国的海上路线

亚洲棉种以及植棉技术传入中国南方路线应该包括由一条陆上中印通道和海上多条扩展路线构成，中印陆上通道是“海上棉花之路”的基石，正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的便利，棉种及植棉技术得以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

1. 滇西中印通道为“海上棉花之路”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早在汉代初年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一条通往印度阿萨姆的捷径，即由四川经滇西哀牢夷聚居区（今保山、永平两县），通过缅甸北部进入印度阿萨姆邦。据《后汉书》中对哀牢夷的记载：“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3]而帛叠与兰干细布都是棉织品^[4]，说明至少在汉代云南棉织物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时，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植棉与棉纺织技术在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在位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时期曾经在蜀郡得到广泛流传，甚至由于品质较高还返销回印度和阿富汗。公元前122年，张骞（公元前164～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归国时提及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过蜀布（白叠布）。而据众多学者的考证，张骞所见到的蜀布是蜀郡商人经过滇越贩运到印度，再转卖到大夏国的^[5]。

在航海技术不够发达的秦汉时期，正是有了这条从中国云南经缅甸联接印度阿萨姆邦的通道，将棉花及植棉技术输送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并在西南边疆地区生根发芽，为“海上棉花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①亚洲棉的发源地是印度的阿萨姆邦，该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丰富、气温舒适，非常适合木本亚洲棉（图1-1）的生长。同时，中国云南地区的纬度和气候与印度阿萨姆较类似，有利于木本亚洲棉移植。②秦汉时期，在中印之间就已形成了一个畅通便利的海路网络，然而，这一时期西航印度半岛需要十个月的时间。显然，通过航海路线将木本亚洲棉棉种带到中国沿海地区并不合适。一方面，古代作物栽培一般是沿着陆路或海岸线缓慢接力式传播，很少进行点对点式的传播。其主要原因在于作物对于气候非常敏感，只有当作物适应了传播的第一站的气候才能进行第二站传播。另一方面，古代通过航海线传播的作物要想获得成功，必然要有优于本地作物的特征。众所周知，最初棉花的采摘、去核工序所花的人力比起葛麻作物的杀青、绩接等工艺并不占有任何优势。因此，在棉花去核工艺的效率没有提高的状态下，植棉想要得到广泛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木本亚洲棉的传播开始必然是通过中印之间业已存在的陆上通道缓慢地传播至中国云南境内，并试图向西川和向东两条陆路发展，向西川发展的那一支受到丝织工业的抵制，向东发展则未遭遇重大阻力^[6]。由此可知，植棉向东蔓延的结果必然是发展到中国以及中南半岛的沿海地区，从而为“海上棉花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由印度培育的新